

毛泽东 对历史的考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

邹 兆 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邹兆辰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

ISBN 7-81039-608-0

I. 毛… II. 邹… III. 毛泽东-历史-考察-研究
N. A8 4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0515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9 千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3.00 元

序

瞿 林 东

1994年岁末，兆辰同志携着他新近撰成的书稿《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来到我的寓所，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兆辰很谦虚，他说本书着重讨论了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认识的一些问题，希望我在序文中就毛泽东的史学理论遗产讲讲自己的认识，以有助于读者全面地认识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作者对友人的直率和对读者的诚恳，使我打消了种种避嫌的顾虑和自觉鄙陋的惶恐心理。因此，这篇序，就从我对毛泽东的史学理论遗产的一些肤浅认识说起。

—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有丰富而深刻的论述，对史学和史学工作也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上的阐释或论断。关于前一个方面，已有许多论著作了阐述；这里仅就后一个方面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对历史知识之重要性的十分重视。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说道：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①对现实的洞察必须建立在对它的历史的洞察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的许多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伟著作给予人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这方面，毛泽东不愧是马克思的伟大的继承者。今天，当我们重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他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等论著时，总是会为贯穿于其中的巨大的历史感所感染。它们使我们感受到：现实在历史中怎样继续和发展，而历史又怎样活在现实之中。它们之所以能够教育人、折服人，其中不仅仅是现实的事实，也还有历史的启示。这是毛泽东重视历史知识并以他对历史的卓越见识跟现实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理论的力量。

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的极其深刻性和极其重要性，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摆到和革命理论、对实际运动的了解相同的位置上看待，还有比这更重视历史知识的认识了吗？当然不会再有了。凡是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很少有人不熟悉这几句话的。但是这句话所给予历史知识如此重要的位置，或许并不是很多人都真正理解了。诚然，革命理论是极其重要的，毛泽东曾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可见革命理论对于致力于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人和政党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诚然，对于实际运动的了解也是极其重要的，凡致力于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人和政党，如果不了解实际运动的状态与发展趋势，则无法积极有效地投身于实际运动，更谈不到正确地把握和领导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以下引《毛泽东选集》均据第2版，不——注明。

② 《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际运动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的极其重要性，不论人们在事实上做得怎样，达到何种水平和程度，在思想上还是比较容易引起重视的。至于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历史知识”，为什么也具有这样的极其重要性呢？对此，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是作了明确的阐述的。根据我的肤浅认识，毛泽东的有关阐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知识对于人们认识国情是必须的。毛泽东历来十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而所谓“国情”，它首先是现实的，即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口、资源等等；同时，它又是历史的，即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种种历史遗存和历史传统，而要真正认识这些历史遗存和历史传统，人们有必要弄清它们的全貌和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实”的国情，是空洞的；没有“历史”的国情，是残缺的。何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本无截然划分的界限。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一种不良的学风，这种不良的学风表现在对待历史知识上就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这种作风危害之严重，就是：“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①这些话是毛泽东在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800页。

整风运动期间说的，可谓字字千钧，而他对于理论、历史、现状的极其重视，是贯穿于他的思想和实践之中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不懂得现状就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同样，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即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

第二，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所必须的。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①这里就包含了历史知识对于人们的现实抉择所具有的参照价值，它在中国史学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有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一开始就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弄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②倘若“过往的来程”搞不清楚，“未来的去向”是不好作出“决定”的。上文讲到对于国情的认识，不仅要了解现状，还要了解历史，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思想与实践给予人们更丰富、更深刻的启示。举例来说，毛泽东为了科学地论证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他在1939年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为了说明上述这些问题，即在阐述“中国革命”之前，他首先阐述了“中国社会”，包括有关“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概述。他明确地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这里，我们不来复述毛泽

① 《战国策·赵策一》。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东在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的科学论断，我们要强调的是，他对这些科学论断的论证和说明，都是把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即对于“中国的国情”的认识，作为“基本的根据”。可以说，对于历史知识的运用，在毛泽东这里是提到了跟战略思想相关的高度上来对待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历史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历史见识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不仅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尤其具有卓越的历史见识，因而当他把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作为“基本的根据”提出某一路线、方针时，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战略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深邃思想和政治远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名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发展之阶段的划分，都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卓越的历史见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的其他许多论著，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和方针，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的运用和卓越的历史见识的发挥。

第三，是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际运动所必须的。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都不能不总结前人的以及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否则人类社会便不会有所进步。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如此，否则你便不能得到成功；即使侥幸得到成功，也难以巩固它、发展它。人们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而从事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又创造出来新的经验，成为后人继承的历史遗产，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当然，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有一个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发展过程；人们到了能够自觉总结历史经验并用于自身社会实践的时候，也存在着自觉程度的高低、对历史经验总结的深浅、用于实践得体与否的差别。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殷周之际，人们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意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汉初、唐初、两宋之际、明清之际，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思想成果尤为突出。鸦片战

争以后，面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促使人们从近代意义上对历史经验的思考，提出救亡图强的方略。毋庸置疑，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见解对于人们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不可缺少的。如同马克思“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历史一样，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更是十分认真地研究了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历史，并从中总结出来历史经验，以指导当前的实际运动。毛泽东重视运用古代的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存在着的严重的流寇思想，是十分突出的一例。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①这一历史经验的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包含了对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的继承，也包含了对古代军事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经验总结与继承。他在《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中，讲到战争中主观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时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战例，他列举了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毛泽东的上述规律性认识，正是从对这些战役的经验总结中升华而得到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从星星之火到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是何等的重要。至于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毛泽东选集》第1至第4卷来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他在1944年写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一篇关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方法论的名作。他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接着，他概述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这四次“大的骄傲”而“吃了亏”的教训，进而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他在1944年3月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再次讲到此文，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②在这里毛泽东是从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一条共同的规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尽管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历史内容不同，但若不懂得历史，不总结历史经验，不从历史经验中获得鉴戒，都绝无例外地要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今天读来仍然字字千钧。

如此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历史知识之重要性问题，因为这已不止是历史学上的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革命运动中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了。

历史知识，按其本身的实际价值来说，它既具有历史的品格，又具有现实的品格；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些，是否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来它的这两种品格结合的“艺术”。毛泽东正是善于创造这种“艺术”的大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十分强调总结和继承历史遗产中的珍贵品，这是他十分重视历史知识之重要性的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观念。

讲到历史遗产问题，毛泽东有一段名言，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他说的“我们这个民族”，是指中华民族；他说的“特点”和“珍贵品”，是指中国历史最基本的特点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毛泽东以庄严的态度对待历史和历史遗产，对于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他都作了科学的概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特点和历史遗产作了明确的阐述。

特点之一：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特点之二：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特点之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①

这些特点，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面貌。毛泽东所作的这些概括，对于今天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仍然是有意义的；对于今天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也是有意义的。

关于历史遗产问题，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问题，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概括：“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② 上文讲到的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等精神品质，也是历史遗产的重要方面。概括说来，这里包括了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典籍、优秀人物和精神品质等，都属于历史遗产范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珍贵品。这种珍贵品的价值的世界意义，可以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来说明。早在17世纪，弗兰西斯在所著《工具论》第1卷第129节中已经指出：“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其后，马克思又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③ 而今，当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被众多的人们所认识到了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623页。

② 同上，第622页。

③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第1版。

史上的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进程曾经起过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毛泽东所说的“珍贵品”就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对他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优秀的历史遗产”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从一定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尽管辉煌的历史不等同于现实，但辉煌的历史可以激励人们创造辉煌的现实和辉煌的未来。

毛泽东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是提出了“总结”和“承继”的任务。不“总结”，不足以弄清“珍贵的遗产”的面貌；不“承继”，不能够发挥“珍贵的遗产”在现实中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方面是借以指中国历史，一方面也是强调了从孔子到孙中山其间古往今来许多优秀历史人物所创造的“珍贵的遗产”，而并非仅限于思想家和政治家。

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珍贵品”、“珍贵的遗产”，对它们进行总结，并结合现时的历史运动予以继承和发扬，这就把学习历史知识加以深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遗产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运动中获得连续性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为自身的生存、进步、昌盛作不懈的努力；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秀的历史遗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伟大的凝聚力。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本世纪以来有不少经验教训。五四运动作为新的文化革命的开端，它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但它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上的片面性，确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来过。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不论是以“革命”的名义否定一切历史文化遗产，还是以“法家”的名义去“批判”历史文化遗产，都给历史文化遗产制造了空前的灾难。80年代中期，又有以西方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的出现。这些教训在性质上和所产生的影响上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在对待历史遗产上

都违背了科学的原则。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振奋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会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些论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倡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结合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十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倡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这是从两个方面概括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和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人们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根本区别。他说的“能够”，是指人们开始具备了这种科学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人们只有在学习和掌握了这种理论和方法的时候，才会使“能够”成为能力，使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只有经过自觉的和刻苦的学习才能掌握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强调以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

义为理论指导来研究历史和现状的重要。

1939年，毛泽东致函范文澜，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必要。1948年，他就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在写给吴晗的信中说道：“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1965年，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就章著《柳文指要》一书写道：“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①他在给何干之、郭沫若的信中，也包含有这方面的思想。通观毛泽东的这些论点，他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即指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这是人们正确地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基础。综观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他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即：“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②概括说来，这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决定了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在无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社会里人们结成了各不相同的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以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致章士钊信中所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是指阶级社会而言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引进”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其中不乏可以借鉴的东西，但这里所说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仍是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310页、6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283页。

动摇不了的。诚然，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倾向，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偏差；然而这种倾向和偏差并不是这种理论和方法必然导致的结果，这是应当加以区别的，而过去的偏差也是可以在新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得到纠正的。

第二，是历史主义。毛泽东在讲到总结和继承历史遗产时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讲的历史主义，首先是强调了尊重历史，“不应当割断历史”，即强调了历史运动中的古今联系和辩证发展。毛泽东指出历史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指出历史遗产对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主义即是其重要的理论、方法论根据之一。他的这个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如下的阐述：“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历史主义要点的极明确的概括。

历史主义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要顾及到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②“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当不限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广泛地说，这适用于对一切历史问题的评价，否则，尊重历史也就成了空话。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② 见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何历史评价，如欲不陷于片面性、简单化，就必须对历史条件作科学的分析，并使之与被评价的对象结合起来，从而作出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说明。这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科学工作，只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才可以获得科学的认识。

第三，是区别精华和糟粕。毛泽东在讲到民族新文化的时候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 这里提出了区别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的原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出现过、存在过的东西未必全是进步的；而从全局、从整体来看是进步的东西，也可能在局部上、部分上存在着落后的方面。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总结和继承，就应当对其进行分析，辨别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精华和糟粕的界限，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们需要人们去辨别；要辨别，就不能没有辨别的标准。毛泽东提出封建性与民主性的区别或腐朽性与民主性、革命性，这是从大的方面、原则的方面提醒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个原则运用于对历史文化遗产作具体分析时，情况要复杂得多；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努力揭示这种复杂的情况。举例说来，如封建社会中的“君权”，自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因此从历史进程来看，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不论是从君权的实施来看还是从人们的君权观念来看，都存在着不受制约和有所制约的区别。至于神权、族权、夫权，情况各异，但人们对待它们反映在观念上的区别，也是存在的。对于一部具体的文化典籍来说，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共存，难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然而经过认真的分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